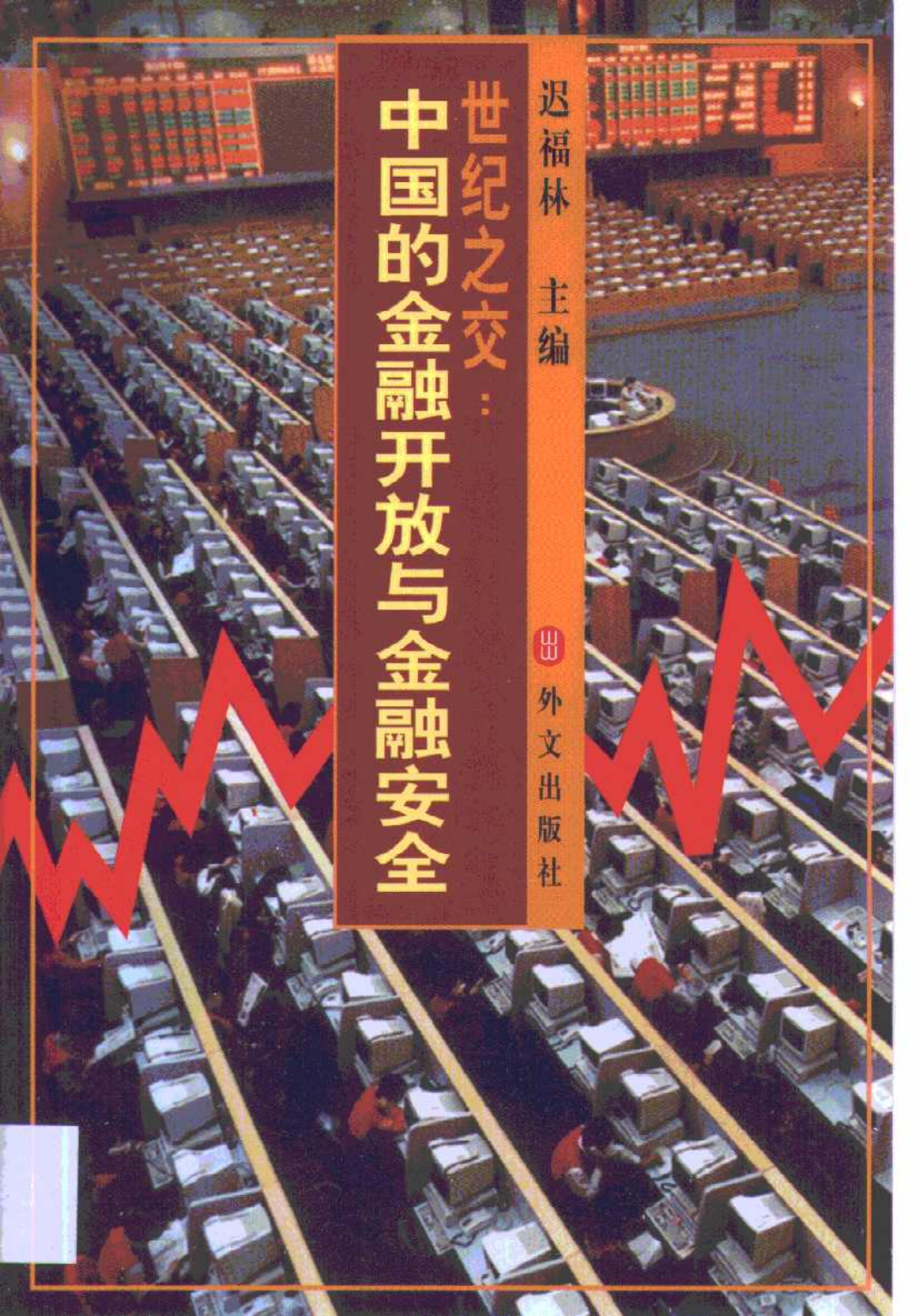




迟福林

主编

出

外文出版社

世纪之交：
中国的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世纪之交：中国的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迟福林 主编

外文出版社

第一篇 总 论

世纪之交：中国的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中外专家谈中国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一、世纪之交，国际经济面临着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挑战

1、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特征是不确定性增强，风险性加大

东南亚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重新认识。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以金融经济为主的年代，以工业为主的年代已慢慢褪色。在这个时代，交易的商品往往是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的。许多金融工具，如利率、汇

率、股价等主要取决于难以捉摸的预期心理,而预期心理取决于信心,信心则是极受外界影响的心理因素。因此,未来二十一世纪是个极不安定的世纪,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冒一定的风险。

2、资本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有效投资,加速了金融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的基点在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虽然直接投资只占国际支付的3%,但它们被理解为一个促进全球化的真正发电站,这主要是指它的活力。1972-1996年这段时期,国际贸易增长指数是18,国际金融增长指数为42。这些数字表明全球化的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进一步阐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资本和货币市场越来越很少受国内政治事件的影响,资本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有效益的投资。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国际间的商品和服务交换变得越来越容易,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正在加速。预计到2015年,大约80%的市场将会开放给竞争者,今天这个比例仅是20%。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但表现为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扶持各自的企业进行国际竞争,公司与公司之间也将进行更加直接和更加自由的国际竞争。

3、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是通货紧缩

世纪之交,危机的天平已经从通货膨胀转向需求不振,即是说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已经从过去的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世界银行最近估计,1998年的世界经济只增长1.7%,仅仅是一年前预测的一半,1999年世界经济估计只增长1.9%。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不久前指出:我们正面临市场需求减缓的局面,这种情况何时才会结束?对美国国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没有人知道。

二、金融的开放与金融的安全要结合起来

1、在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金融的开放

改革开放必须和国家的安全结合起来,在安全基础上促进开放。十多年来,国际组织一直在要求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只是单方面宣传和施加压力。认为责任都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他们拖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后腿。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济发展除了要求贸易、金融自由化之外,也要求金融监管,要求发挥政府的作用。

2、产业是根,金融是叶,只讲金融安全,不讲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要正确处理金融安全和金融发展的关系。这一年多来,我们谈论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安全较多。因为金融风险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对我们的影响相当大,使得我们要认真考虑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如何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以及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更主要的是要强调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我们分析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时,经常说我们此次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是因为有两道防火墙:一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可兑换;一是外资不能进入中国股票市场的 A 股市场。这两个因素是我们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击、抵御国际影响、国际投机资本袭击的两道防火墙,这是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这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如果没有这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 14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因此,金融发展应放在首位。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只讲安全,不讲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不能够通过金融的发展来支持经济的发展,经济保持在低水平、落后的水平上是最大的不安全。所以,当前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防范金融风险,来

保证金融安全 and 经济安全,但更主要的是要把立足点放在发展上,发展金融,发展经济。

3、讲金融风险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发展问题

东南亚与东亚金融危机是在经济表现比较好,成长性较强的国家发生的,这给增长性较强的国家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经济发展应该注意回避金融风险的问题,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使我们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造成不可低估的经济倒退。现在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防止用一种现象掩盖着另一种现象,就像我们过去讲发展的时候,不注意风险,因此发展就掩盖了风险。今天我们讲风险的时候,又要注意到可能掩盖着一个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1998 年国内拉动投资需求的困难性至少表明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经济的风险性。根据调查,一些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与银行的贷款控制性有很大关系。现在银行有惜贷行为,银行说它并不是在惜贷,而是在控贷,怕出现风险和危机,这样就给扩大内需带来一些困难。防范和回避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是要依靠发展,而金融体制和其他宏观体制应该具有两个功能:一是避免金融风险的功能;二是推动增长的功能。体制措施如果仅仅是防范金融风险,那么就可能牺牲增长,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金融体制基础还是很脆弱的。

目前我国很多改革措施确实不是按发展金融服务系统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要求来进行的,而是趋向一体化、集中化,这实际上是在把风险向金融系统集中。

4、东南亚与东亚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步伐并没有放慢

东南亚与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停止对外开放的步伐。例如:(1)日本 1997 年下半年制定了“冲绳自由贸易区法”,它的目标相当明确,要以 2001 年为期限,把冲绳地区开辟为自由贸易区,以此来振兴产业的发展。(2)韩国关税厅 1998 年

12月22日宣布韩国在今年上半年将开拓五个关税自由区,而且在今年上半年要完成立法手续,今年下半年正式运作。(3)东盟国家1998年的部长会议将把2010年前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时间提前到2003年,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还想把时间提前到2002年。可见,以促进开放为目标的优惠政策方式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把握机遇,把优惠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反危机与经济全球化融合起来。

三、世纪之交,推进金融自由化的重点是加强金融监管

1、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是监管跟不上发展

国际金融体系在过去五十多年对推动战后重建,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90年代这个体系就渐渐不灵了,90年代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金融事件足以证明,当前国际金融体制出了一些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归根结底是跟发展和监管两者有主要关系。过去二十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是突破性的:第一,新兴市场快速开放和自由化;第二,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强大推动;第三,金融产品推陈出新,尤其是衍生工具,把整个投资推向高杠杆、高风险;第四,私人金融机构的实力越来越雄厚,美国一些大基金掌握上千亿美元的资本,甚至比一个国家力量还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监管没有跟上,最主要的问题是跨境资本流动,这是个灰色地带,无人监管。还有就是金融机构的信息资料披露不够,特别是私人机构。再就是银行监管方面薄弱,中国的商业银行也面临这个问题。新兴市场的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现在发展成为一个炒卖市场。

面对上述问题,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开始重视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并已经有一系列的动作,今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

(一)建立国际认可的监管标准,充实加强巴赛尔委员会的监管条例,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对冲基金的监管。

(二)市场透明度问题。现在透明度不够,对私人机构的财务报告要统一标准,包括期限性、稳定性、完整性、连贯性等等,再就是对私人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策略要披露。

(三)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应加强合作。同时,由于现在私人机构力量太大了,应该加强国家与私人机构合作。

2、金融自由化不能只讲开放、不讲监管,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加强监管

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处在增长和体制改革转型这个阶段的国家,考虑他们的特殊情况、特殊利益。全球金融体系是由发达国家统治和主导的,国际资本市场上也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做主导。因此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强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金融监管需要的透明度问题。讲到透明度问题,多数都在讲发展中国家应如何透明。但是,很少有讲到发达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投资者如何有一定透明度的问题。第二,杠杆问题,这么大的国际资本,再加上杠杆作用,以小博大,怎么降低风险,没有杠杆,资本市场不活跃,资本市场无效率,但是这个杠杆过大了,带来的风险也过大。第三,对现在的拯救措施、拯救计划怎么进行修改。如何研究一种新的应付危机的措施。在危机发生后,借款者和贷款者双方能够走到一起,重新安排债务,这样一个体制比由一个国际机构出来拯救这些贷款人的办法要好。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应该允许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步骤和策略,而不能从国际金融组织的角度只讲开放不讲风险。过去总讲开放的程序问题,但到了具体问题总是大大表扬很开放的国家,对不开放的国家总是采取惩罚措

施,而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第四,国际金融体系如何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帮助,如何在制定改革政策时进一步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如何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金融管理知识和操作上的帮助,对降低全球的金融风险都有好处。

3、银行的监管要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央行的首要职能是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能是保障货币稳定、价格稳定,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实现此职能,央行要有独立性。这一点对完成其首要职能很重要,并且能保证连贯性和可信度。而央行政策是否连贯已成为金融市场衡量央行可信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致力于保障价格稳定并且能独立于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央行最能为市场增强信心。欧洲的央行主要是保障价格稳定,在欧元地区使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控制在2%以内,欧洲央行也支持欧盟的整体经济政策,但条件是不能与其主要职能——维持价格稳定相冲突。

欧洲央行的领导层不会接受来自上层政治人物的指令,具有独立性,完全控制着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汇率政策的责任则由欧洲央行和欧洲委员会共同承担。央行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非货币政策的其他任务。如果银行业的监管可由其他主管部门来完成,央行就能避免被迫成为最后借贷者而无法完成其保护货币的任务。欧洲央行不允许为成员国的官方机构提供信贷,也不对银行业监管负主要责任。

维护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要从中期效果角度考虑,因为实施货币政策到产生效应之间存在着种种时间差。(2)透明度要高,这样公众就可自行判断央行是否在执行以前宣布的政策,否则就无法在金融市场上增强公众信心。

四、中国金融体制要避免风险,出路在于加强改革

1、中国的银行业与国家以及国有企业的关系要彻底改革

首先,银行业的经济和法律框架需要得到改善。过去曾采取措施加强由市场分配资本的职能,而不是根据信贷计划直接贷款,这种做法需要坚持下去。否则,对银行的补贴成本太高,而成本要由纳税人、贷款人和储蓄人共同承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及盈利离不开健全的政策、市场和法律环境。健全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银行业的关系,是取决于金融合同,而金融合同最重要的形式是贷款合同。因此,银行应有权自主地和客户就贷款条件进行协商,并有合适的机制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如果客户破产不能按合同还贷,银行应有权拿客户的资产或没收其抵押品来抵债。另外,商业银行要有自由设定利率的权力,并根据风险和回报选择客户。

其次,中国的银行借贷目前正起着和商业银行运作原则不相符的作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财政再分配应该由国家的财政预算来完成,而不是由商业银行来完成。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商业银行就无法健康运作了。调节经济发展功能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来承担。

第三,商业银行应完全与政策贷款脱钩。

第四,很多银行业问题来源于不恰当的会计制度。资产要得到客观的评估,否则不清楚中国银行业的真实经济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商业银行是否提供贷款应基于风险的大小。在中国银行业中,资本的衡量很不准确,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因此,银行资本与债务的定义要有明晰的法律依据,并且在银行清算账目中得到执行,这样,银行是否能健康运作就一目了然了。

第五,银行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降低风险:

①减少债务:坏账是银行陷入困境的关键,坏账高达 25 -

30%。按西方标准计算为 50%。银行的股东要为减少债务起作用,最好的方式是建立一个专职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坏账问题。

②资本结构调整:一旦坏账比例确定,国家应发行大量债券给银行注入新的资本。

③从中期来看,利率应放开,先放开借贷利率,再放开存款利率。否则,银行不能根据风险设定恰当的利率。

④应有存款保险。德国在 70 年代建立存款保险制度,100% 的保护私人存款者的利益。

⑤坏账问题要解决。要使银行业健康发展,必须引进竞争。新银行可依法成立,破产银行要关闭。国有商业银行不能占垄断地位,要有相当数量的银行与其竞争。

⑥银行业只有在解决了现有主要问题后,改革才能取得明显成效,只有在引进了竞争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对外国银行开放。否则,操之过急会引起更多问题。

⑦加强监管和调控(如资产负债率、管理层素质等),加强实施有关法规。

⑧银行改革要与国企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同步,因为它们相互依赖,只改革银行而忽略其他方面不会成功。

⑨关键的次序应为:减少负债、重新资本化、调控和竞争。

2、金融体制既要避免风险,又要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转变增长方式

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要避免金融风险,又要推动经济增长,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抗风险的能力。经济的粗放化程度越高,风险就越强,反过来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越高,安全性就越强。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同增长方式的转变相适应。东南亚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专家们分析危机的因素,

主要指出了外资的作用、投资的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产业政策、扩大出口等方面。这些因素有可能推动增长,也可能产生危机,但关键是它如何在转变增长方式中起作用。例如,就资本积累和利用外资这两个因素来看,利用外资和资本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在利用外资和资本积累时需要注意避免几个问题:一是要注意外资的结构。外资结构的主要问题为:(1)直接投资比重过高,这些投资的风险会更大;(2)短期外债比重过高。二是民间投资数量过大。高投资是由高负债支撑的,靠银行贷款,或是国外借款,债务负担过重,风险性加大。三是过高的投资主要是投到了投机性比较强的股市和房地产。

四是扩散风险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扩张的过程中,应主要依靠自有资本来进行扩张,而不是依靠银行贷款搞扩张。这些推动增长的因素,如果不注意它内部的结构,如果不防范其风险问题,就可能造成危机。

3、银行改革的重点是尽快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

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估计是30%,其中15%压在国有企业下,15%压在房地产下。我们讲的不良资产并不都是坏账,原来统计的不良资产有三种形式:第一,逾期贷款。第二,呆滞贷款。第三,呆账,即死账。呆账约占6%,约为两千五百亿元左右。不良资产里有这样几部分:一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的政策性贷款;一部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一部分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不强,效益不好,还不起贷款;还有一部分是国有企业没有资本金,政府已经没有钱来给国有企业支付资本金,因而用银行的贷款来代替政府投资,形成一些由贷款建立起来的百分之百负债率的国有企业。

如何化解这些不良资产:

第一,发展股票市场,使企业增加股本融资,从而解决银行负债率很高的问题。

第二,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在需要国家控股的一些行业的企业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也就是把国有股的比例下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少。这样企业里既有国有股,也有非国有资本,形成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使企业内部真正以所有者为代表,对上可以抵制政府的干预,对下可以对经营者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竞争力都会提高。

第三,有30-40%的不良资产是押在房地产上,应结合住房改革,把闲置的房子卖出去,这可以盘活一部分银行的不良资产。

企业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是盘活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这些改革不能用现在这种完全依靠政府的办法,而是应该通过市场,特别要发展资本市场,运用市场的办法重组企业,这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也是化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

五、根据市场规律,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1、使用浮动钉住汇率的办法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和固定汇率相比,浮动钉住汇率制有较高的可信度。要达到很高的信用度,一方面要有令人信服的宏观经济条件与政府实施稳定政策的决心;另一方面还要有适宜的制度条件,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政府可以实施这些政策,并且充分受到公众的监督。中国现在不具备条件来实施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浮动钉住汇率制是结合两者优点的最佳选择。

①和固定汇率制一样,它提供了一种名义上的稳定性,有利于公众信心。

②如果浮动钉住汇率制以达到长期而真正的汇率平衡为目标,其可持续性更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发生,后果也没那么严重。

③如果小幅浮动的速度和方向可以调整,信用度会更高。只要调整有利于改善平衡就会得到认可。

④中国政府具备维持小幅浮动的一系列条件:外汇储备充足;货币政策的微调能力有所增强等。

⑤中国政府有渠道掌握实施威廉森提出的名义浮动汇率所需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应该提供给市场。

⑥根据中国有限的短期资本越境流动性,汇率浮动范围可偏低,即上下浮动不超过 $\pm 5\%$ 。

⑦浮动的速度依不同的通货膨胀情况而定。在没有必要使用名义上的固定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对通货膨胀预测的间隔可拉长(如从一月一次变为三月一次)。这个过程可增加透明度,并且增强浮动钉住汇率制的信用度。

2、金融市场愈开放,汇率制度应愈灵活

放开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国外资金流入,给维护金融稳定提出了新的难题。政府的货币政策在此情况下会非常谨慎,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竞争。在这个背景下,政策可信度比以前更显得重要。许多新兴国家为提高其政策可信度把其汇率与世界主要货币挂钩,如美元。但决策者常常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政策意义。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必须紧跟挂钩国的货币政策,尽管挂钩国的经济体系及运行和外贸都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放弃了他们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这样它们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完全不适合国内需求的政策措施。因此很多实行汇率挂钩国家存在着政治紧张局面,并且最后因为负担太重而不得不放弃挂钩汇率。外国资金流入,银行以固定汇率购买,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这样,外国资金流入加上固定汇率制会引起“过热”问题并产生通胀,导致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因此,金融市场越开放,汇率制越应灵活,不遵守这个规则,就要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最近的例子是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国和巴西,有些国家如智利、马来西亚和俄国,试图通过资本控制来解决汇率制与国内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盾,但资本控制的缺点是国际资本分配的不合理,使得资本控制本身最终失效。如果要控制的话,也应是暂时性的,并且控制解除的标准要事先申明,资金流入的控制要优先于资金流出的控制,最后控制应集中在短期资本的流入上,特别是有价证券的流入,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

六、加强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1、组成金融联合体,以便两岸三地重大金融举措一致动作

两岸三地不仅应合力筹建共同的金融预警机制,借此加强区域性经济金融的预警能力,未雨绸缪。鉴于各自当局目前的政策,现可成立民间或半官方的金融合作促进会,作为咨询智囊机构,组织各种有利于两岸三地金融合作的活动,建立人才交换培训制度,增进对双方金融制度运作的了解。允许对方在自己指定的地区设立金融网点、金融机构,签署通汇契约,加强货币的同业拆借往来,放开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具体形式可由民间到官方,由低级到高级,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到银行金融机构,让三地的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在当地融合。其次,建立区域性的金融服务中心,提供金融、期货、信托、保险、证券等服务,形成一个多功能、开放型、辐射强、效率高的金融市场体系,创造三地之间相互衔接的经济环境。进而应该积极思考两岸三地统一货币和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构建,成立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次区域性金融机构,以便两岸三地重大金融举措一致动作,提高两岸三地在亚太地区 and 全球的竞争能力。

2、两岸三地央行负责人加强联系和接触,共同商榷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措施

东南亚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两岸三地受其冲击暴露出各自金融实力及其金融管理体系的弱点。三方央行负责人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重,加强联系和接触,

定期或不定期会面,坐到一起共同探讨两岸三地金融的合作和发展。尽管一时很难制定出金融合作方案,至少使三方对彼此间调整利率、汇率、出台金融政策等重大举措心中有数,相互一致行动。

具体的合作方式上,短期内不太可能一下发展到三方中央银行之间拆借外汇的密切程度,但可以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如:交换资讯;建立工作对口窗口,预防发生金融危机或监视金融风暴与情势发展;举办两岸三地经济金融问题论坛,借以交换金融自由化和建立金融管理制度经验;协调彼此金融管制措施,堵住国际投机流动资本的漏洞;寻求共识,共同参与在 APEC 或亚银架构下建立区域金融稳定基金等。这些合作,不但有助于两岸三地货币汇率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更有利于东亚地区经济金融之稳定发展,有利于海峡两岸发挥共存共荣的经贸关系。

3、从民间合作开始,由民间机构牵头,以研究机构为基地,使两岸三地民间的经济金融整合分层次逐步向高层合作过渡

由于存在种种客观原因,两岸三地现存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以香港和台湾、香港和内地为主。因此两岸三地的金融沟通与合作可分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内地与香港,香港与台湾;二是内地与台湾。实践中可以从第一个层面开始,循序渐进,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基于两岸三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迥异,两岸三地经济金融合作可选的最佳途径和模式,可由官方授权民间机构处理,逐步向半官方和官方层次提升。具体做法可以从推动“三通”着手,然后设立机构,协调双方金融政策,促进成立经济共同体和建立共同金融预警机制。

由于涉及“身份”问题,在金融沟通合作的具体方式上,两岸三地官方的经济、金融合作尚有一定难度,因此可考虑先从民间的合作开始,确定某一研究机构牵头,使两岸三地的民间机构进

行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带动其高层的接触与合作。实践上可以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为基地。近年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凭借其显著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为基地,集中两岸三地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研讨,就三地之间的金融合作的问题进行合作综合研究,向政府提供咨询和金融政策建议,是目前可行的办法。

(1)提供、交流两岸三地的客观经济资料及国际经济金融信息,加强三地之间的相互了解,使港台商担心的所谓“内地政治不稳定,政策会变化”的误解得以澄清。特别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今天,国际投机资本到处兴风作浪,及时掌握整个世界重要的大资本的法人基金会的历史背景、近几年的作为等有关信息,了解国际投资资本利用的机会和所采用的方法,对两岸三地防范金融危机尤为重要;(2)根据研究成果为各地提出预警报告,以便各地能够及时的预防和采取正确果断的迎战策略,使两岸三地能密切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投机资本,使其无机可乘,维护本地区的经济金融安全;(3)研究机构通过共同研讨,一致提出两岸三地进一步合作实践层面的建议,提交各当局,供决策层参考,促进高层的合作;(4)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研究三地金融合作的发展规划,设计两岸三地合作实践性、操作性方案;(5)通过召开学术会议扩大影响,通过大家呼吁和努力推动,促进两岸三地经济金融合作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4、以香港为金融中介机构,促进两岸三地金融、贸易、产业等方面的合作

两岸的经济互动中,贸易、金融、投资大部分均经过香港来进行,香港目前仍是亚太金融中心,具有良好的信誉及交易记录,在目前的一段时间内,香港仍可担当两岸合作的中介者。然而,香港的金融业除了服务于本地区域的经济外,还需旁边有一些其他